

唐朝的女性服饰

蒋彦

唐朝盛世的灿烂文化自然离不开服饰的装点，因为服饰是每一个时代最为形象和最为直观的“档案”。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巅峰的唐代，在服饰文化上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无疑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丰碑。从山西永乐宫的壁画以及唐代著名仕女画家张萱、周昉的传世作品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那种女着袒装的雍容华贵、女扮男装的飘逸俏丽以及女着胡服的干练秀俊。同时，历代的文人墨客也为此留下了精彩的吟咏，如方干《赠美人》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李群玉《赠歌姬》中的“胸前瑞雪灯斜照”、元稹的“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物胡乐”等，通过这些精当的描述，也可以让我们对唐朝女性的服饰及着装特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唐朝时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与齐梁新声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仪、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及文化观念的大交流、大融合。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唐代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外来文化的注入又使得女性着装观念的开放成为可能，于是才出现了诸多艺术作品里所勾勒出的唐代女性在服饰装束上那种“显山露水”、标新立异的风韵。

唐代女性崇尚红色，喜用红、绿两种色彩来装扮自己，或衣衫用红色，裙子用绿色，或裙子用红色，衣衫用绿色。从《虢国夫人游春图》及《调琴啜茗图》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装扮的习好。然而就布帛的颜色而论，是绝不止于这两种的，单红色类，就有大红、正红、粉红、水红、杏红、桃红、梅红、石榴红、银红、茜红、焦红、血红、猩红、退红、乌红、绛红等十几种，绿色类也分官绿、碧绿、明绿、柳绿、葵绿、苔绿、豆绿等。除此之外，明黄、土黄、嫩黄、莺黄、鹅黄、淡黄、藤黄等黄色类，真紫、北紫、油紫、大紫、墨紫等紫色类，品蓝、宝蓝、深蓝、湖蓝、天蓝等蓝色类以及蟹青、蛋清、粉青、天青等青色类也都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从质料上看，分绫、罗、锦、纱、縠、绢、绣、绒等品种。唐绫大多以纹样命名，常见的幼鹤绫、缭绫、独窠绫、梁

窠绫、四窠绫、鱼口绫、镜花绫、云花绫、仙纹绫、葡萄绫、双距绫、马眼绫等。其中尤以缭绫最为珍贵。白居易曾作有《缭绫》一诗，对这种织物作了生动的描绘：“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绢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此外，元稹的《织妇词》、司马札的《蚕女》、王建的《当窗织》中，也都有关于这种织物的描述。色彩和质料的丰富也为唐代女性服饰的极大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社会，从统治阶级到下层平民似乎对女子头戴幂篱、身着男装袍裤的形象都抱以默允的态度，以致女性男装化的风尚在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中华古今注》明确记录了唐朝女着男装的情景：“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鞞帽，内外一体也。”《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可见当时世人对此风尚的态度。《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这一个笑字似乎完全瓦解了上层社会对女着男装的敌意，反而添增了几许鼓励。懿德太子墓的墓门石刻，至今还保留着两个头戴浑脱帽，上着小袖宽领衣，下着波斯条纹锦镶边长裤，足蹬软底镂空锦靴的女扮男装形象，给后人提供了这种风尚的最为直观的视觉形象。

开放的风气造就了唐人浪漫而又富有革新的精神。在对外交往频繁、对内随意自由的宽松环境下，女性争奇斗艳、不拘一格的着衣风格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文化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必然结果。而在今天，这朵炫目耀眼的奇葩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上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